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专刊

孙中山基金会丛书

孙中山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办

林家有 主编



孫中山研究

歐初



第四輯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孙中山基金会丛书

孙中山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办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专刊

孙中山研究

第四辑

林家有 主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孙中山研究. 第四辑/林家有主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218-07600-3

I. ①孙… II. ①林… III. ①孙中山 (1866~1925) —人物研究—文集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7607 号

Sun Zhongshan Yanjiu (Disiji)

孙中山研究 (第四辑)

林家有 主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金炳亮

出版策划: 王俊辉

责任编辑: 王俊辉

封面设计: 张竹媛

责任技编: 周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sh.com>

印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18-07600-3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3.5 字数: 420 千

版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1487 83790604 邮购: (020) 83781421

目 录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 张 磊 张 革 (1)
- 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自觉实体的形成…………… 林家有 (7)
- 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的振兴…………… 王 杰 (22)
- 存异求同与另辟蹊径
- 海峡两岸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近况与思考…………… 赵立彬 (31)
- 官方纪念与政治评述：新中国对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纪念…………… 谷小水 (41)
- 形象化的辛亥革命
- 从火柴盒贴看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 蒋海波 (51)
- 辛亥革命前夕广东民间的女性观…………… 李兰萍 (66)
- 上海橡皮股票风潮与辛亥革命前的中国社会…………… 徐淑静 (78)
- 三·二九起义后广州的社会氛围与广州光复…………… 徐 磊 (84)
- 孙中山与梁启超辛亥革命论的比较…………… 郭 辉 (97)
- 丘逢甲与广东咨议局…………… 李振武 (109)
- 《孙文与日本有关人名录》解说…………… [日] 安井三吉 (115)
- “创立合众政府”与联邦制理想…………… 李吉奎 (121)
- 二元择一
- 孙中山与兴中会同仁对君宪革新和共和革命的取舍…………… 莫世祥 (128)
- 孙中山“中华民国国父”称号的考察…………… 苏全有 (146)
-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与英国及英国人之关系初探…………… 邵 雍 (156)
- 孙中山两度由天津赴唐山、山海关的考证及“北方大港”、
唐津运河计划的提出…………… 邹佩丛 (165)
- 孙中山的近代城市建设思想和实践…………… 庞 毅 (181)
- 孙中山伦敦蒙难与清国驻英公使的撤换…………… 杜志明 薛 菁 (191)
- 试论孙中山的债务观
- 以革命举债和国家建设为中心…………… 刘 杰 (212)

辛亥前后孙中山的“共和”心理	楚秀红（221）
民国时期学人对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解读	
——以《东方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鲁法芹（228）
孙中山的发达国家资本论与公营事业之发展：台湾的观察	翁嘉禧（251）
略论谭平山“科学的三民主义”	张晓辉（266）
“闲话不闲”：《革命闲话》研究	张金超（274）
《伍汉持烈士纪念碑》略论	李兴国（285）
1919—1936 年国民党澳门支部的形成与演变	张中鹏（296）
1903 年孙中山在曼谷的活动	
——读泰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有关孙中山 1903 年访曼谷的资料 ...	余定邦（305）
祖强自撰年谱	黄健敏整理，漆德红校对（324）
清末香洲商埠史料补辑	韩明章辑录（346）
约稿启事	（368）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

张 磊 张 莘

时光流逝，辛亥革命已经临到百周年纪念。在这期间，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关于这场划时代变革的历史记忆并没有被淡化和忘却。确切评价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科学、深刻、全面地总结经验教训，发扬先驱者的爱国主义和变革精神，依然是一项兼具学术性与现实意义的重要任务。

作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与近代化先驱，孙中山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发生在 20 世纪初期的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未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处境，但却结束了绵延久远的封建帝制，打倒了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清朝政府，进行了政治、思想的启蒙，推动了经济与社会的变革，冲开了进步浪潮的闸门，为后来的斗争开拓了道路。孙中山不愧为辛亥革命的主帅和旗手，辛亥革命则是孙中山的主要业绩。

—

孙中山是革命民主派的卓越政治、思想代表。他首先提出了明确的、系统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当时条件下，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无疑是比较先进的、科学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方案，对解决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所面临的中心课题——独立、民主和富强的理解与构想，较之单纯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纲领优越得多。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获得了三民主义的指导，方才具有比较完全的意义，从而跨越了鸦片战争以来长达半个世纪的“准备阶段”，进入更高的正规时期。

围绕着近代中国亟待解决的社会政治、经济重大课题，民主革命的承担者分别给出了答案。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和社会矛盾愈趋激化的严峻情势下，农民阶级提

出了朴素的斗争纲领，进行了多次反抗乃至战争。维新派传播了社会变革的方案，作出了付诸实践的尝试。他们的活动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性质，产生过一定的积极、进步的作用；但对历史的使命缺乏自觉的、完满的认知和实践，难以胜任民主革命的艰巨任务。

尽管魏源等开明人士早在《海国图志》中曾经称道过美国的共和制度，认为联邦宪法“可垂奕世而无弊”，但目的仍是借“悉夷情”以利“筹远”，唯有孙中山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第一次提出了带有共和制度要求的纲领。与农民阶级和维新派的方案相较，他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比较完满地回答了历史的课题，反映了基本的国情，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近代化趋势，把民主革命推进到新的阶段。辛亥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就在于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纲领。

二

孙中山又是革命民主派的杰出领袖。1894年冬，他在檀香山组织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新世纪来临后，他创建了统一的、全国性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这个具有近代形态的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有其他派别不可比拟的优点。农民阶级的带有宗法性的、宗教色彩的秘密结社固然难以望其项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松散的“学会”也不可同日而语。革命政党的领导显然是正规的民主革命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辛亥革命主要就是由同盟会所领导的。

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政党，是时代和革命的迫切需要。历史已经证明，近代中国的正规民主革命，既非农民阶级的旧式秘密结社所能承担，也非维新派的各种“学会”所能肩负。革命民主派必须自我组织起来，建成近代形态的政党，发挥“革命的中枢”的作用，才能胜任正规的民主革命的领导重担。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清王朝的覆灭正是“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起推”的结果。

同盟会的组建标志着革命民主派的活动进入新阶段，成为民主革命高潮的起点。第一，同盟会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接纳为斗争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无疑是对民主革命的主要课题的概括，堪称比较完整的民主主义纲领。它同兴中会初创时的政纲相比有着长足的进步，主要是明确了共和制度的诉求和补充了社会经济方案。较之同时的革命团体华兴会、光复会的政纲，则具有更丰富的民主主义内涵。第二，同盟会在组织方面有所改进。它效法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原则，设立了评议、司法、执行三部，总理则由会员每四年公举一次。第三，同盟会的主干大都是革命知识分子。作为其所属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他们胜

任政治指导者的角色。大量的先进知识分子加盟，增强了同盟会的能量和活力，同时，也密切了同盟会与国内的联系。第四，在同盟会内部形成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领导集团。孙中山被一致推举为总理，在他周围团聚了黄兴、宋教仁、朱执信和廖仲恺等一批颇有威信和经验的领导人。这个领导集团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基本上肩负起领导重任。近代民主革命的特色之一，就是领导核心不是个人而是群体。第五，同盟会制订了比较完整的纲领、方针和政策。1906 年秋冬之际，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编制了同盟会的《革命方略》，供各地革命党人武装起义时遵循和应用。除《军政府宣言》具有纲领性外，其他文件的内容主要关乎实施方针、政策问题。第六，同盟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政党。除本部外，同盟会在国内设置了东（上海）、西（重庆）、南（香港）、北（烟台）、中（汉口）五个支部以及下属的各省分部。在国外，建立了南洋、檀香山、欧洲和美洲四个支部。同盟会摆脱了先前许多革命团体的局限性，真正成为指导、推动革命运动发展的主导。在短短的几年中，同盟会进行了大量的、广泛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两方面的活动：同保皇派开展了空前规模的论战，广泛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批驳了反动的保皇谬论，为辛亥革命扫除了思想障碍；坚持了武装反清斗争，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因之，为辛亥革命这场全国范围的武装反清斗争积累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三

孙中山还是革命民主派从事的“战争事业”的坚决倡导者。从组建兴中会起，他就把反清武装斗争当成民主革命的主要手段，始终重视革命暴力的作用，既摒弃了维新派的上书请愿方式，又超越了囿于皇权主义的农民战争。孙中山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及其实践有着重大意义，反映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基本特点——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为了推翻封建王朝、建立共和国，必须诉诸革命的暴力。摧毁了清帝国的辛亥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全国范围的武装斗争。

坚持反清武装斗争是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革命民主派活动的特点和优点。所以如此，是由于他们在这方面的理念和实践反映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规律。严酷的现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人民群众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榨，而没有起码的民主和权力。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任何反抗，都会招致反动政权的残酷镇压。甚至堪称“跪着的造反”的维新运动，也以“六君子”血洒京师街头而夭折。为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政府偶尔作出的“改革”姿态，实质上都是为了苟延残喘的狡猾手段。以清末鼓噪一时的“假立宪”为例，无论是迟迟不能兑现的钦

定《宪法大纲》，还是已经开设的咨议局、资政院，实际上几乎没有改变人民的无权状态，以致立宪派都普遍感到失望。因此，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为独立、民主和富强而斗争，不可避免地要诉诸暴力手段，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清朝政府。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认识和实践了这个道理，对于他们从事的革命事业大有裨益。孙中山的政治生涯几乎离不开“战争事业”，从他开始组织革命团体起，就进行了几次反清的武装斗争，到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到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统治。

孙中山对于革命暴力手段在斗争过程中的重大意义并非一开始就已认清，只是在经历了一段实践乃至“顿挫”后，他才理解了武装反清斗争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民众的自发反抗和农民战争曾给他以影响，但最终使他踏上武装反清斗争路途的还是政治活动的最初教训。正是在上书李鸿章失败后，他才“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①甚至实行君主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为真立宪”，因为指望统治者“来将国家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官方迫于形势而作出的诺言，也只能是“舍本逐末”的“用以缓和民众骚动情绪的具文”。所以，孙中山创建兴中会后立即着手策划广州起义，后来又发动了著名的惠州起义，革命党人展开的多方面活动，包括宣传鼓动、筹款、联络会党和其他社会力量也都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反清武装斗争。同盟会于1905年夏成立后，孙中山马上派遣会员分赴华南、西南和长江流域，进行实地调查，准备武装起义。1907—1911年，孙中山在西南地区（主要是广东）策划了七次起义——潮州黄冈之役、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之役、河口之役、广州新军之役和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之役”。在镇南关之役中，孙中山曾亲登镇北炮台轰击清军。对于遍及各个地区的反清武装斗争，孙中山也极力给予策应和支持。

直到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所策划的多次起义大都以失败告终。造成这种悲剧性结局的原因很多：没有练成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装；从外面“输入”械弹以及战斗人员；各自为战，不相联属……更为严重的弱点则是没有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致使起义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难以具备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但是，决不能因此贬低反清武装斗争的重大意义。持续不断的起义，给予清朝统治者以沉重——尤其是在政治上——的打击。同时，一幕幕悲壮的战斗激励了群众，提高了革命党人的威望，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事实上，每一次武装起义都为最终推翻清朝政府积累着胜利因素。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更成为辛亥革命的序幕。正如孙中山后来所指出：“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

^① 孙中山：《伦敦蒙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4页。

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①

四

孙中山不愧为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捍卫者。他在武昌起义引发革命烽火遍燃的时刻返回祖国，建立共和制度成为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他旋即被推选为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组建和主持了设在南京的临时政府。在短暂而又极其困难的三个月里，他力求对新生的共和制度有所建树。但是，形势迅速逆转，革命似乎仍在行进，实际上却是内外交困。临时政府面临着各种压力：西方国家均未承认共和国；临时政府甚至没有预算和财源；革命政权缺少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非袁莫属”的呼声甚嚣尘上。当然还有同盟会内“革命党消”的观念潜滋暗长……孙中山虽然对“于民国安危最有关系”的问题“在所必争”，实际上却“一筹莫展”。当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所支持的“强有力的人”——袁世凯及其后继者攫夺后，他又举起旨在捍卫共和的“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与两次护法运动的旗帜。孙中山在 1912 年 4 月 1 日于临时参议院发表的解职词中曾经宣称：“三月以来，南北统一，战争告终，造成完全无缺之中华民国。”然而，他的被迫辞职决不表明辛亥革命的完满结束，却成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起点。后来的“再造民国”的斗争当可视为辛亥革命的延续，却亦不过是强弩之末与微弱的回声。孙中山和革命民主派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建树了不朽的业绩。但是，他们不可能把革命引向彻底的胜利。这是历史的必然：不仅由于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还因为革命民主派与对手相较在政治上、经济上“异常软弱”，缺乏 18 世纪法国革命的领导阶级的力量和性格。不能挣破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枷锁，民主革命与近代化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正如孙中山在 1924 年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指出：“曾几何时，已为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②

历史进程往往出现暂时逆转，但绝不会停滞不前。在辛亥革命后的惨淡岁月中，迅速呈现出新时代的曙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人类带来了理想和希望。五四运动

^① 孙中山：《〈黄花岗烈士事略〉序》，《孙中山全集》第 6 卷，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50 页。

^②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 521 页。

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意味着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开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所取代。迭遭挫折而“愈挫愈奋”的孙中山积极迎接了历史的跨越，决心“另为彻底之革命运动”。他带着长期革命斗争——特别是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投身于新的战斗：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孙中山以革命精神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晚年的理论和实践适应了历史的特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为北伐战争创造了条件。在经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战争和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民主革命的胜利完成，辛亥革命的“未竟之业”得以圆满实现。只是孙中山由于积劳成疾，于1925年3月逝世。其时，“革命尚未成功”，但以广东为策源地的大革命风暴即将席卷神州大地。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青史长存。

今天，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着全国人民为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先贤、先烈们的爱国主义与变革开拓精神，学习他们无私奉献的崇高情操，推动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大业早日实现，为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张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张苹，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自觉实体的形成

林家有

辛亥革命是 20 世纪中国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结束了中国传统的封建君主制度，而且还带来了共和、民主、现代的新制度，它不仅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民族旧观念，而且也带来了中华民族自觉实体，开辟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新纪元。诚如金冲及先生所写：“人们常说改称‘民国’无非只是换了一块招牌，但是没有这块招牌，它的区别不能小看。从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和思想解放的意识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① 没有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及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今天中国的伟大辉煌。总之，对于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意义毋庸置疑。



何谓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自觉实体形成于何时？中国国族的形成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这在学术界早已引起重视，但看法并不一致，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老一辈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过：“伟大中国的主人是伟大的中华民族”。“广大的中国疆域，不是哪一个民族所能独力开发出来的，她是许多已经消失了的和现时正在发展的各民族合力开发，经数千年的艰苦奋斗，才逐步建立起这个伟大的中国来。”^②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如何凝聚为中华民族的整体，各民族文化的精神又如何荟萃为中华文明，这是长期以来我国学者重视研究的一个问题，但是中华民族的概念何时出现？它的涵义是什么？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何种影响？

^①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 1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 页。

^② 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学习》杂志第 3 卷第 1 期（1950 年 10 月）。

则有诸多不够明晰的陈述。比如说，我们要弘扬民族精神，弘扬哪个民族的精神？又比如我们宣传和强调民族主义的重要性，我们究竟是要宣传和强调哪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又比如我们曾经强调要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又应如何地理解这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这都是我们在研究和思考近代中国历史时绕不过去的问题。

过去有的学者为了避开长期以汉族代表中国的弊端，凡讲到中国民族时则用“支那民族”或中国民族的模糊概念，凡讲到中国民族精神时则以“支那人”的精神或中国人的精神概括。其实，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它未能反映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实际。为了解决这个实际问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一些高明的学者和政治家则创造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将古代中国的“中华”和近代西方“民族”相结合，统称为“中华民族”。

何谓中华民族？1987年9月，中央民族大学陈连开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含义初探》一文中指出：“‘民族’一词，在古代汉语里没有构成，大约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从日文中引进，当时含义并不统一，直至目前，各家使用也不完全一致，不过比较通行的是泛指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处于不同社会发展水平的稳定民族共同体。在民族一词出现以后，不久也就出现了‘中华民族’一词，最初是指中国的主体民族，即汉族；随着中国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日益自觉地结成整体，它的全部含义才得到了充分的阐明：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许多民族在结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①1993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由刘荣焞、李毅夫、吴从众、曹成章先生为《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百科全书》撰写的“总论”中，对中华民族又作如下概括：

“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各民族整体的称谓是在近代才出现。

“中华民族”是中国历史疆域和今天疆域内具有民族认同的各民族的总称，是与各民族共存一体化过程中实现认同的客观事实完全一致的理论概括。

今天的中华民族，包括汉族和其他55个民族及为数众多的海外华人。^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李新先生则认为，“中华民族是个复数词，不是单数词。”何思敬主张称为中华诸民族。“不承认几十个民族的存在是错误的”，“不承认

① 陈连开：《中华民族的含义初探》，《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② 刘荣焞、李毅夫、吴从众、曹成章：《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百科全书总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动态》1993年第2期、第3期。

中华大家庭的存在也是错误的。”^① 应该如何解决汉族与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中的关系？以往的研究虽有提到，但并不能从理论的高度给予合理的说明。1988年8月，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 Tanner 演讲会上，提出了他多年来在探索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问题，才比较圆满地解决了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里，中华民族又包含汉族和 50 多个少数民族这样一个复杂的又是现实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费先生说：

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 11 亿（按，指当时中国的总人口数）人民。它所包括的 50 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

费先生又说：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距今 3000 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②

那么，中华民族的自觉实体形成于何时？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对于中华民族概念和自觉实体的形成，一般都只是说在近代中国才出现，有的说是在 20 世纪初年出现中华民族称谓，也有的说中华民族称谓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之交出现。费孝通先生也只是说：中华民族自在的实体是在近代中国各族人民共

^① 李新：《关于编写中华史之我见——答史式教授》，史式、黄大受主编：《中华民族史研究》第 2 辑，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7 年版，第 2 页。

^② 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36 页。

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才形成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也没有说形成于何时。

刘荣焌等先生也写道：“‘中华民族’这一称谓出现以后，人们对其含义的认识经历了一段逐步深入与明确的过程。”但“中华民族”这一称谓出现于何时，他们也没有明说。从他们的行文推测，好像最早是梁启超提出来的。他们说：

1906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按：该文写于光绪三十年，应是1904年，非1906年），用“中华民族”一词称呼汉族；以“中国民族”一词称呼其他各族。后又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研究》一文中，以民族认同的心理特征为标志，指出“中华民族”应包括中国各民族：“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点浮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国之一员也”，并举例说：“故凡满洲人今皆中华民族之一员。”^①

金冲及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巨著中，在介绍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发表的一些文章的影响时也写道：“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民族’这个名称最早可能就是出现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篇文章中。”^②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发表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梁启超在该文中讲的“中华”，还不是中华民族，实则指“中国”。他说：“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③据一些文史学家的考证，“中华”一词由“中国”与“华夏”两词各取一字构成。“中华”一词独立出现，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若使游步中华，聘其龙光。”当时，“中华”主要指黄河中下游一带，是一个地理概念。作为地理疆域之概念，随着各朝代疆土扩大而扩展，各朝代所统辖之范围，皆为“中华”。而“中华”作为“中国”、“华夏”二词的合并使用，又往往成为“华夏族”、“汉族”的代称，所以有人说“华族”就是“汉族”，在历史上

① 刘荣焌、李毅夫、吴从众、曹成章：《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百科全书总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动态》1993年第2期。

②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页。

③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卷2“学术类一”，台南市大学书局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20页。

确是这样。^①

陈连开先生则认为,“在古代,中华主要还是作为文化与民族称谓。”“在民族一词引进后,不久就复合出‘中华民族’一词,最初一般是指中国的主体民族,即汉族。”^②

总之,“中华”与“中华民族”不是同一含义,“中华”一般指汉族,“中华民族”是中国众多民族自觉认同、自愿地联合成不可分割的统一实体。

“中华民族”一词最早由谁提出和使用?据有关记载,很可能是伍廷芳。

1900年11月20日,作为清朝驻美公使的伍廷芳,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作了一个题为《外国人在中国不受欢迎的原因》的演说。他说:“中国人原先并不反对外国人来到他们的国家,但后来一个接一个战争以及和约签订,中国被迫给予外国人特殊的权利,更不用说为每次战争支付给对方沉重的赔款了。这便是外国人在中国如此不得人心的根源之一。还有就是传教士侵犯了非基督徒中国人的权益,这就成了外国人在中国人中间不得人心的另一个原因。”然后,伍廷芳指斥外国在华的报刊几乎每星期的一些专栏都在斥责中国政府及其官员,“它总的论调很可能引起全中华民族反对外国人和外国事物。”^③伍廷芳之后,中华民族一词便在中国流行,但作为官方的正式文件对外公布是在1912年1月5日,孙中山作为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的《对外宣言书》。宣言书说:“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④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自觉实体的形成是辛亥革命的结果,它是与中华民国同时诞生的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称谓。

二

华夏族是一种民族联合体。汉族是一种民族联合体。中华民族也是一种民

^① 李立纲:《汉族与中华民族史研究散论》,史式、黄大受主编:《中华民族史研究》第2辑,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69页。王树民先生研究指出“中华”一词,起源于魏晋。最初用于天文方面,是从“中国”与“华夏”两个名称各取一字复合而成。(见《中华名号溯源》,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

^② 陈连开:《中国·华夷·藩汉·中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研究初探》,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60页、66页。

^③ 伍廷芳:《外国人在中国不受欢迎的原因》,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0-110页。

^④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页。

族共同体。^①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下五千年”，这五千年是从黄帝算起，是讲中华民族先民活动的历史而已。罗香林先生于1949年前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史学方法论》，第一讲便是“中华民族的长成”。他认为“自夏朝起，中华民族始有完整的国家组织，同时也自夏朝起，中华民族始有显著的民族意识”。^②史式先生说：“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究竟有多么长？过去说是上下五千年；现在看来，显然不止五千年，从考古发掘的成果来看，近万年。在这万年之中，大部分的时代是没有帝王的。”如果从“朕即国家”的专制皇帝秦始皇算起，到今天不过2200多年；如果从部落联盟的大酋长夏禹算起，到今天也不过4000多年。^③中华民族自在实体如何形成，这是复杂的过程，不是本文研究的范围，暂不去理它。至于中华民族自觉实体的形成，跟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则有重要的关系，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一个民族是自在实体还是自觉实体，关键在于这个民族有没有自觉民族意识以及稳定民族实体的人们有没有自觉地认识到本民族的现状、命运和前途，并为改变民族的境遇合力团结奋斗。所谓民族意识，就是同一民族的人具有共同的民族观念，有彼此一体、利害与共的感觉以及在一定文化传统积淀下形成的共同心理素质和精神基础。有了民族意识才会产生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有了民族意识，民族的成员才会热爱自己的民族，珍惜本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的意识产生于中国各民族反抗侵略的斗争，这是毫无问题的，诚如陈天华所陈述：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湾），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④陈天华这个控诉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有识之士对中国前途的担忧。

面对当时中国的情势，梁启超感慨地写道：

今之世非昔之世，今之人非昔之人。昔者吾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非不能为国民也，势使然也。吾国夙巍然屹立于大东，环列皆小蛮夷，与他方大国，

① 史式、黄大受主编：《中华民族史研究》第2辑，海口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54页。

② 罗香林：《中国民族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53年版，第7页。

③ 史式、黄大受主编：《中华民族史研究》第2辑，海口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58页。

④ 陈天华：《猛回头》，《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36页。